

新民歌运动中的文艺界

史星宇

(南京大学 历史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展的新民歌运动,文艺界也参与其中。从收集、整理民歌,协助各地出版民歌集,到研究、赞美民歌的艺术价值,展开关于民歌创作手法和诗歌发展道路的两次大讨论,再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发表许多“民歌体”的作品,文艺界在这场诗歌运动中偏离了健康的轨道。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关键词:新民歌运动;文艺界“大跃进”

中图分类号: I207.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7902(2013)05-0114-09

1958年,一场号召全民写诗的新民歌运动风行全国。各地农村、工厂、街道、部队等成立了数以万计的创作小组,参加者有七八岁的儿童,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各种报刊开辟专栏,大量登载新民歌;各种赛诗会、诗歌擂台、诗街会等风起云涌;各地还运用各种手段,营造“诗的海洋”,如诗棚、诗窗、诗碑、墙头诗、机床诗、枪杆诗、炉壁诗、诗传单、田边竹签诗等等。还涌现出了如湖北洪安、江苏白茆等诗歌乡,以及许多所谓农民、工人、士兵诗人。

文艺界也积极参与其中,作家艺术家赞美和研究新民歌的艺术价值,拔高新民歌的价值,积极收集、整理民歌,“身体力行”地参与新民歌的创作。

—

1957年冬,在农村水利建设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歌。比如:

“山硬硬不过决心,山高不过脚心。要使九百一十三个山头,一个个的向人民低头。”^[1]

“河滩变良田,秃山变良山。大家加油干,幸福在眼前。”^[2]

“头一年是调皮捣蛋,第二年是半干不干,第三年是试试看,第四年是——谁让我退社,我的一身骨头散。”^[3]

文艺界注意到了这些作品。1958年初,中国民

间文艺研究会编选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收录了许多这样的民歌。《文艺报》1958年第4期(2月出版)上,徐迟发表《人民的歌声多嘹亮》,引用了河南、湖北、江西、山西四省的一些民歌,称赞它们:

“迟早,它们会编印成书,更广泛地流传的。随着生活的前进,新的歌谣还会不断地唱出来。这已经愈来愈明显了,我们的文化高潮正在涌来!”^[4]

萧三辑录了一些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发言中引用的谣谚,称之为“最好的诗”。臧克家说:

“这样的诗篇,读了叫人聪明;这样的歌声,听了叫人心动。征服自然的响亮口号,它充满了信心和豪情!每一首诗跟着一场猛烈的斗争,它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5]

这些新民歌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他要求:

“各地负责同志回去收集一点民歌,搞几个试点,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收集,下次会议印一批出来……这个工作(即收集民歌),北京大学做了很多,我们来搞,可能找到几百万、成千万首的民歌。”^[6]

毛泽东的号召,为新民歌运动拉开了序幕。文艺界最先做出反应,出力最多的是郭沫若和周扬。

4月14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

收稿日期:2013-07-15

作者简介:史星宇,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

地收集全国民歌》。同一天,郭沫若接受《民间文学》编辑部访问。他赞扬说“现在党把收集民歌抓了起来,各省各县都动了起来,这就会出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局面……现在的搜集工作是由群众来做,各地都会出许多大大小小的孔夫子”;“不仅要搜集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古代的也不要丢掉,少数民族的民歌也应该注意”。他号召“用多快好省的方法来采集和推广民歌民谣,不仅不允许踟蹰,一定要鼓足干劲。”^[7]

4月16日,郭沫若又在《中国青年报》称:

“古时候有过采风,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大量采风,中国的新国风,将来的首数恐怕要以亿为单位计算……今天的民歌民谣,今天的新国风,是社会主义的东风。这风吹解了任何可能有的冻结。人民的心都开出繁花,吐放芬芳。”^[8]

他还亲自创作了不少仿照新民歌体例的诗歌。比如,配合“大跃进”氛围的《向地球开战》:“只有愚人的字典里面,才能寻找得出这个字——不可能!”^[9]。他仿李清照《声声慢》,写了一首《声声快》:

轰轰烈烈,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10]

他所写的《百花齐放》,共101首新民歌。从4月3日起,至6月27日止,陆续在《人民日报》分8次刊出。为何有101种花?郭沫若在后注里表示:

“普通说‘百花’是包含一切的花。只选出一百种花来写,那就只有一百种花,而不包含其他的花。这样,‘百花’的含义就变了。因此,我就格外写了一首‘其他一切的花’,作为第101首。我倒有点喜欢101这个数字,因为它似乎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11]。

郭沫若说:

“写这些诗从3月30日开始,1956年做过三首(牡丹、芍药、春兰),除此之外,一共费了十天工夫。感谢全国生产大跃进的东风,这东风一吹,便使百花齐放了。”^[12]

这101首看似咏花的诗歌,表达的却是政治情感:

“我们是催进派而不是促退派,年年春节,为大家合唱迎春歌(水仙花)。”^[13]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鸡冠花)^[14]”

“为什么不肯栽培我们,同志,我们多么愿意,向党交心肝!(石楠花)”^[15]……

1958年7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这101首诗集结出版。8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时,为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还配上了木刻家刘岷的刻图,采用大32开本,十分醒目。

周扬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新民歌运动。4月26日,周扬主持召开民歌座谈会,首都文艺界著名人士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郭沫若、老舍、郑振铎、臧克家、赵树理、阳翰笙、顾颉刚、江鲁、贾芝、林山、湖北省著名诗歌县——红安县委宣传部长童杰等应邀出席。文艺界人士就搜集民歌的重要性、方法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表示在创作上要向民歌学习。周扬在会上提出:

“请民间文艺研究会提出一个具体规划,收集全国从古到今的民歌,地方收集后进行初选,北京成立一个委员会,订立体例,然后一本一本地出。”^[16]

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扬做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系统论述了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阐明了搜集民歌和其他民间文学的方针政策。他说:

“民歌成为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精神渗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新民歌中有不少具有高度思想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一面鼓励群众的新创作,一面大规模地有计划地搜集、整理和出版全国各地、各民族的新旧民歌,这对于我们现在文学的进一步民族化、群众化,将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它将开一代的诗风,使我国诗歌的面貌根本改变。”

他预言不久的将来:

“群众诗歌创作将日益发达和繁荣,未来的民间歌手和诗人,将会源源不断出现,他们中间的杰出者将会成为我们诗坛的重镇。民间歌手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线将会逐渐消泯。到那时,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

周扬认为,毛泽东所提出的新民歌“两结合”的写作手法:

“人民群众敢于幻想,并且能够用自己的

双手把幻想变成现实,这就是民歌中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根源。”

周扬进一步指出,“两结合”的创作方式是:

“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7]

周扬的发言,引用了10首“大跃进”民歌,并且编选了110首“大跃进”民歌,汇成《新民歌百首》,作为发言附件印发与会代表。

周扬、郭沫若还一同主持编辑了《红旗歌谣》一书。他们从全国数量众多的新民歌中精选300首,加工润色后由《红旗》杂志社于1959年9月出版。所收300首诗歌按内容分为4个部分,包括党的颂歌(48首)、农业大跃进之歌(172首)、工业大跃进之歌(51首)、保卫祖国之歌(29首)。诗歌数量对应《诗经》三百篇。他们在《编者的话》中赞美说,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袁水柏称赞《红旗歌谣》,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三百篇’,是中国革命诗歌的瑰宝,中国革命文学的骄傲……许多优秀的民歌肯定是不朽之作”^[19]。

二

在新民歌运动中,文艺界争相赞美新民歌。他们将收集民歌与商周时的采风相类比,称之为新时代的“国风”,是共产主义文学的萌芽;表示所有文艺工作者都要向新民歌学习,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袁水柏认为,新民歌“创作上比作家走前了一步,同当前政治运动结合得非常紧密,许多优秀作品,值得作家拜倒在它们面前。把这些民谣民歌整理编印出来,对我国诗歌创作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它会成为作家的借鉴,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诗人深入群众中去和创作群众化的问题。”^[20]

林陵说“几十年来我们的诗始终没有找到、没有创造出最能代表我们这一时代精神的形式来,我们的新诗始终没有成为广大人民自己的诗,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恐怕主要是没有更多的采用民歌的形式,我们的诗人没有更多地向人们学习。”^[21]

贾芝说“大跃进的歌谣是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相结合的开端,又反映了目前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的共产主义新迹象,它是共产主义的萌芽。”^[22]

毕革飞称“这是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成果……不仅是全民大跃进的号角,并且是共产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的部分。”^[23]

赞美的同时,文艺界迅速组织起来,开展搜集活动。《民间文学》杂志在3月刊上发表《大家动手,及时捕风》称:

“汇集、发表这样的作品,促进对于新时代的人民口头创作的搜集和研究,是中国民间文艺研究和本刊‘民间文学’当前的首要任务”。^[24]

4月起,各省省委陆续发出收集新民歌的通知。各地文联、文化局、出版社等,在省、市委宣传部领导下,组成民歌收集小组,负责收集和鉴别下级单位送交的诗歌,同时派出人员深入各地搜集。

在山东,由省委宣传部领导,省文联、文化局、山东人民出版社、大众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一部分编辑人员,组成了山东省民歌编辑组,负责全省的新民歌搜集工作;安徽省各级党委、各级文化部门和数万个农村文化馆、站展开收集,一些文艺干部爬山越岭,深入山区和田间,进行访问记录;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作协分会联合组织了一支调查队,包括115名干部和高等学校师生及100多名翻译工作人员,分批深入到西双版纳、德宏、红河、大理、楚雄、文山等6个自治州和丽江专区,在傣、彝、哈尼、白、纳西、僳、苗等民族中调查、搜集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和文学资料^[25];青海省委宣传部发动了省级各文艺团体350多人,先后在果洛、玉树、互助等地,分别对藏、土、撒拉等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普查和整理研究工作^[26];内蒙古自治区文艺工作者纷纷成立采风小组,深入农村、牧区、建筑工地,大量搜集民歌和创作新歌。

1958年7月9日至13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了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民间诗人、歌手、民间文学工作者、群众文化工作干部和作家、艺术家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全体与会代表,陈毅到会讲话,周扬根据大会讨论作了总结发言。大会听取了贾芝关于民间文学工作的报告,40多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会议认为,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文艺创作,在目前就是工农群众的创作。它一向都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紧密结合,直接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是人民的“心声”。新民歌是劳动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的旺盛表现,是“大跃进”中最吸引人、最鼓舞人的现象之一;是劳动人民创造力的表现,是群众文化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大会针对当前的形势,提出今后的工作任务是全面搜集、整理研究,使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都得到整理、广泛传播和正确的评

价。在搜集方面,会议提出,从第一次国内战争起,各个革命时期的革命民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歌和旧时代一切被压迫人民所唱的民歌都要搜集,要有重点的进行整理,优先整理对建设社会主义帮助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适当加工。会议提出,在收集整理的队伍方面,要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民间文学工作队伍,建立搜集新民歌、其他民间文学作品的常设机构。^[27]

诗人们不仅收集新民歌,自己也参与创作。全国文联在大门外的墙上贴起了街头诗,每周一期,臧克家、袁水柏等均在上面发表诗作;徐迟在河北省怀来县的暖泉乡写街头诗,田间则在那里发起了“诗传单”运动;老舍为北京王府井北口人行道上的“街头说唱牌”写诗;沙鸥在十三陵水库工地为工人们写快板诗;李季和闻捷在甘肃为报纸写诗,和报社订立合同,有新消息立即通知,由他们配诗,往往半夜起来写,第二天见报,平均2天半就有他们一首他们的作品刊出。^[28]田间在作家协会召开的“深入生活座谈会”上,称已写了约130首墙头诗,还计划下半年写作《赶车传》续篇,共5部,1万到1万5千行^[29];1958年春,臧克家在作家协会“创作跃进大会”上表示,全年要完成短诗25篇、长诗一首和评论若干篇,实际写了60多首,并将其中的44首整理成《春风集》出版。他自称,都是“学习运用民歌形式写了一些风味不同的东西”^[30]。

这些作品极力模仿新民歌的语言、内容和题材,歌颂社会主义建设和“大跃进”以来的新人新事。如:

“出工收工看手表,飞机喷洒杀虫药,葡萄架里电灯装,红葡萄送进本乡的制酒厂,白葡萄用自家汽车运天津,西边五道防风林,从此风沙不飞扬,俱乐部里歌声响。”^[31]

“我们是新盘古,要锄云要犁雾;要给水来架桥,要给水来造路;要叫河水上山头,年不下雨保丰收。”^[32]

“铁水流,钢水流;流遍全国省市州,滚滚好似长江水,日夜不停休。海底捞,地下挖,好似旱天找水源,愿为建设大献身,材料沉埋千百年。‘全民抓钢铁’,大家听号召,大小高炉像春笋,风吹节节高”^[33]

“龙王出了水晶殿,急忙奔,脚步乱。拨开云头向下瞧,大吃一惊直冒汗。十三陵,景色变,东西山头看不见,拦河大坝挡着路,好比大山被腰斩,只听机器轰隆响,只见人马千千万”^[34]。

在新民歌运动中,文艺界进行了两次针对新民歌运动的讨论,一是关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一是关于诗歌的发展道路,从理论上研究新民歌。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新民歌“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的统一,太写实了就不能写诗了。”由此,文人们纷纷撰文讨论“两结合”。《文艺报》第9期发表了贺敬之、臧克家、冯至、郭小川、袁水柏的笔谈,《红旗》、《诗刊》、《处女地》、《延河》等刊物相继发表了郭沫若、茅盾、邵荃麟的文章,从理论上、创作上和文学史上,宣扬新民歌的“两结合”创作手法。

1958年10月31日至12月26日,《文艺报》编辑部先后邀请首都作家、艺术家、理论家、编辑和各高等学校教授、青年教师、同学等共140余人,连续举行了7次座谈会,还邀请艺术家们也举行了一次座谈。

在座谈会上,谢冕、吴同瑞、按苗、张文泰、何其芳、臧克家、马少波、郭汉城、严青、凤子、艾芜、贾霁、贺敬之、李之华、陈默、张庚、冯至、沙鸥、杨晦、胡经之、冯其庸、罗毅军、田汉、石丁、吕驥、廖仲安、林志浩、虞棘、陈白尘、老舍、力群、胡一川、张望、钟灵、王琦、齐速、亚明、阎丽川、华夏等40余人先后发言。综合这些人的论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什么是浪漫主义。他们大都引用高尔基的说法——浪漫主义有积极、消极之分。积极的浪漫主义即革命的浪漫主义,“是不拘泥于细节的真实,表现人民的英雄气概和对于未来的梦想”^[35],特指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作品如果缺少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就会大大减弱鼓舞人、教育人的力量。邵荃麟将革命的浪漫主义概括为“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和远大理想,共产主义者的英雄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以及工人阶级无穷的创造性、想象力和幻想力在文学上的反映”^[36]。贺敬之认为,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产生的一些既控诉现实又充满对理想社会幻想的作品,是“两结合”的优秀作品,但“只有到我们这个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革命浪漫主义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完满的表现”,因为这种革命和建设“本身就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新事业,这种事业本身就包含着果敢的冒险精神,包含着敢想、敢干的冲天勇气,这也可以一说是一种伟大的浪漫主义”^[37]。“它表现出

来的人的崇高的理想,能够强有力地激起人们对于现实的革命态度,从而走向改变现实的斗争”^[38]。

第二,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就是将现实的生活与对美好未来的想象相结合。“写的是现实题材,思想感情却不仅限于目前的现实,远远地倾注于未来”^[39]。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对立物的统一,我们的现实主义从不鼠目寸光地拘于一隅,总是高瞻远瞩地向着明天,我们的浪漫主义也从不作无根的梦,发泄时常的呓语,我们永远注目于变革着的现实,为了改进这个现实而脚踏实地地干个不停”^[40]。姚文元将这种结合的特点归纳为:社会生活的根本精神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真实描写和艺术形象上最大胆的幻想、想象相结合,所有大胆的幻想都以无产阶级思想做基础;澎湃的革命热情和踏实的苦干精神的结合;理想及现实的统一^[41]。

第三,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列主义的世界观。“艺术上的表现方法跟我们的宇宙观和主导思想是分不开的”^[42]，“世界观是主要的,它决定了作家或艺术家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现实的态度,也即是决定了创作方法。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作为指导,而就要革命浪漫主义一番,那不会有好处”^[43]，“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44]。诗人们要深入到人民斗争生活中去,要有高度的热情,“在斗争中,在群众中,培养我们的革命风格”^[45]。贺敬之说,诗人“必须有理想,向无限的未来阔步前进,必须有共产主义者的无限广阔的胸怀,必须是集体英雄主义,不满足于一般所谓‘写真实’,需要群众的色彩,更响亮的声音,要更多运用‘不平凡’的情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46]。

第四,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许多人探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反映生活方面的不同特点。臧克家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主要写理想、愿望和未来,在表现方法上,则较多的采用神话故事和夸大的手法。”贾霁提出,除了愿望和未来,革命的浪漫主义也可以“通过现实中最严肃的斗争来表现”^[47]。张庚进一步提出,“浪漫主义对现实的认识,也许比现实主义认识的更深,因为它不仅是对现实的客观描写,甚至也不是简单地把现实中典型加以综合,而是集中了完全是本质的东西表现出来,又和生活中的东西完全不一样。”^[48]何其芳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给人一个感觉,好像现实主义是第二等的概括现实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可以包括现实主义了。”^[49]

也有人认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难以严格区分。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批判,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说文艺的本质是现实主义。然而文艺又是在事实基础上的加工改写,需要想象和夸大来树立典型,这样,它的本质又是浪漫主义的。他们以屈原、李白、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诗词为例,说明这两者是如何交融体现在作品之中的。

还有一些人提出,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或者说,两者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井岩盾认为“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致的……和现实主义相对,浪漫主义,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方法两个方面之一”^[50]。刘芝明建议“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可以把它包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里边,但是否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创作方法而存在呢?这样讲有好处,可以活跃创作,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有关系,但不是一个方法,两者结合比互相排斥更有利于创作”^[51]。

四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新诗的出路是古典加民歌”,隐含了对“五四”以来的诗歌革命与发展道路的否定,试图以新民歌取代“五四”新诗,因而导致了文艺界关于“诗歌到底应该怎么写”,“诗歌发展的道路是什么”的讨论。它涉及对“五四”以来新诗的评价,诗的格律、形式、内容以及新民歌的地位等问题。

1958年的讨论中,雁翼、红百灵、何其芳、卞之琳等先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引起学术界争论与批判。1959年,《人民日报》先后组织两次座谈,之后由胡乔木提议,《诗刊》杂志组织了一次座谈,探讨诗歌道路问题,平息了1958年的争论。

毛泽东发表关于诗歌道路的讲话后,《诗刊》杂志最先做出响应,提出“开一代诗风”的口号。时任作协书记的邵荃麟发表《门外谈诗》一文,称我国新诗运动的发展历程,与我国革命以及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分不开的。“五四”以来的每个时期中,都有两种诗风的相互斗争,“一种是属于人民群众的进步的诗风,是主流;一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反动的诗风,是逆流”。他批评胡风、穆旦等人的诗脱离群众、仇恨革命,并提出“开一代诗风”的关键,是诗人的“工人阶级化”^[52]。由此,揭开了关于诗歌道路的讨论。

对于“五四”以来新诗的评价,文艺界大都肯定它对于中国诗歌发展的进步作用,也集中批评了新

诗存在句子太长,句法欧化,知识分子腔、洋学生腔太重,晦涩难懂,语法不通等问题。“这类诗的作者,不说中国话,不仅在语言、形式上欧化,连感情也是欧化的……不像是中国人写的,倒像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53]。有人指出,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脱离群众“和劳动人民逐渐疏远了,终日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生活,忘了自己的作品首先应该让谁读让谁听,‘为工农兵服务’慢慢地就变成知识分子服务了”^[54]。

要纠正这种弊端,办法就是向民歌学习。闻山称“世界上哪里有比民歌更丰富的诗的资源?诗人,又在哪里能找到比劳动人民更好的老师?”^[55]郭小川说“写新诗的诗人究竟怎样干呢?其实也简单的很,明确的很,你就死心塌地向民歌学习就是了。”^[56]《星星》诗刊提出了“诗歌下放”的口号“诗人和诗的刊物,应该面向工农兵,积极为工农兵服务”^[57],内容上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斗争,抒发劳动人民的情感,形式上采用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诗歌下放”隐含着对“五四”新诗的全面放弃,引起了一些诗人的反对。围绕下放“形式”还是“内容”等问题,雁翼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由此引发第一次争论高潮。雁翼认为,过去的诗歌,“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明确的,发展也是基本上健康的”;诗歌下放“是为了更好的、更具体的发展过去诗歌的主流”除了思想内容要向工农靠拢之外,还要易读、易懂,但无需拘泥于形式,“街头诗不是唯一能够下放的诗”。^[58]

雁翼的文章在《星星》发表后,批评声不断。反对者认为,并非所有形式的诗歌都为大众所喜爱和接受,诗歌下放的目的在于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应该从内容到形式都向劳动人民靠拢。韩郁提出,并不是所有思想内容好的诗,人民群众都会欣赏并且喜爱,“工农兵有工农兵的口味,有他们自己的风格”,所以,“纵使内容更好的诗,如果不讲究形式,也达不到为工农兵服务的目的”。^[59]但他也表示,自由诗将来会被工农所接受,可目前还不行。悟迟提出,“要诗人写一些通俗易懂、反映工农群众劳动热情的诗歌,使工农群众容易接受”,“劝一些诗人要放下架子,目前要做普及工作,以后看情形再慢慢去做‘提高’工作吧”^[60]。

如果说这样的意见还较为温和,另一些人则将雁翼的“不同声音”上纲上线。沙里金认为,雁翼的文章“隐约的暗示了自己过去在诗歌创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对于今天所提出的‘诗歌下放’、‘向民歌学习’的口号含有一种消极的、抱怨的情绪”。对过

去诗歌创作的成绩与缺点“做出了不全面、不确切的估价”。^[61]作协重庆分会在召开诗歌问题座谈会时,对雁翼的批评更重:

(他的错误)不仅仅是表现在这些比较笼统含糊的说法上,而更严重的是他在自己的创作活动中,明显地表现出了脱离生活,脱离群众,顽强地追求名利,掇拾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破烂的倾向……他对学习民歌,改革诗风有抵触,其实是反对诗歌下放”^[62]。

也有人撰文表示对雁翼的支持。余翼洲在《雁翼同志的看法是正确的》一文中赞同雁翼对过去诗歌的评价。红百灵先后发表了《让多种风格的诗去受检验》、《我对诗歌下放的补充意见》两篇文章支持雁翼。他从“百花齐放”的政策出发,提出诗歌在形式发展上的多样性“不是叫诗人们千口一致地唱一个调子的民歌”,诗人应当“带着自己风格的诗去受大众的检验,不一定在形式上死套民歌……各种风格的诗都有它们广大的读者”^[63]。对于当前的新民歌,他认为既有优点和成就,也存在篇幅短小,容量有限,受格律、押韵的束缚等缺点。“把目前的民歌看成是我国当代不可逾越的诗的顶峰是不能成立的”,作家们应该和劳动人民一道,对新民歌进行改造。^[64]

红百灵对新民歌的评价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批评。1958年10月11日,《星星》杂志在成都召开诗歌座谈会,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发表对之前争论的总结性讲话——《我对诗歌道路问题的意见》,透露了官方的态度。将形式问题的争论,归结为谁跟谁走、谁是主流之争“实质上是知识分子要在诗歌战线上争主流、争领导权的问题”;关于新民歌的评价,他认为“说新民歌有局限性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民歌的改造,“一个文艺工作者,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未动,或动的不多,就想去‘改造’新民歌,非常荒谬!”^[65]

何其芳、卞之琳等也反对以民歌取代“五四”新诗。他们承认民歌的感情、内容值得学习,但反对以“民歌体”一统诗坛,反对生搬硬套的仿写民歌,由此引发更大规模的争论。何其芳6月在《处女地》发表的一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提到,“民歌体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因为民歌体有限制”。他指出,民歌的句法与现代汉语有矛盾,体裁有限,篇幅通常较短,不利于叙事和抒发较为复杂的情感,主张在吸收民歌和“五四”新诗优点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现代格律

诗更利于表达当今的社会生活与思想感情。^[66]卞之琳认为,“学习民歌并不是要我们依样画葫芦来学‘写’民歌,因为那只能是伪造,注定要失败”,“诗歌的民族形式不应了解为只是民歌的形式”^[67]。

他们的文章发表后,陈骢、李晓白、张先箴、萧殷、晏明、天鹰等先后撰文表示反对,宋垒在《与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68]一文中批评卞、何否定新民歌的形式,隐含轻视新民歌的观点,想要凭空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所谓“新格律”取代民歌。针对批评,卞之琳写了《分歧在哪里》^[69]一文反驳说,宋要完全否定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她与何其芳不同意这种意见,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分歧。“新格律”是在吸收古今中西各种诗歌长处,包括民歌的基础上的一种尝试。宋垒针锋相对,在《分歧在这里》一文中称,分歧“不仅是轻视新民歌的问题,这是诗歌发展问题上两条恰恰相反的道路”^[70],认为他们实质上是要离开新民歌的道路而发展现代格律诗。

沙鸥在1958年的最后一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诗的道路问题》^[71],总结一年来诗歌形式问题的讨论,称存在5种错误的意见,其中包括“新民歌以内容取胜,形式是旧东西不足道,新民歌的形式无可学习的地方,应当建立一种新的格律体”,点名指出卞、何两人是此种观点的提倡者。卞之琳则以《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72]一文作为回答,除了反驳和否认沙鸥对她的批判之外,也承认自己存在一定的错误,即在新民歌运动刚展开的时候就提出新民歌需要发展和不是唯一的形式有些过早,学习新民歌的要求提得过高,在此时提起格律问题有些不合时宜,以及对于民歌的概念过于拘泥等。同时又指出,这只是因为自己的言论吸引了大家过多的注意,对运动的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所以不合时宜。

1959年1月5日和16日,《人民日报》两次召开诗歌问题座谈会,讨论新诗发展的道路、民歌和新诗的关系等问题。到会的有丁力、何其芳、沙鸥、李广田、林默涵、邵荃麟、林林、宋垒、徐迟、贺敬之、郭小川、萧三等。

关于民歌体是否有限制的问题。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民歌体在句法、体裁上有限制,要表现复杂的新生活不能不有所束缚;一种认为五、七言的民歌体,表现今天的新生活没有限制,“大跃进”新民歌的成功说明了它的生命力顽强,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

关于诗歌的主流问题。有人认为不一定要提主流;也有人认为“五四”以来的新诗有成绩,但也有

很大缺点,它的形式受外来的影响很大,劳动人民不习惯,不喜爱,当前的事实本身说明了民歌是诗歌的主流。会议完全同意李亚群对红百灵的批评,但也提出以后在进行讨论时必须实事求是,概括、引用他人观点务必准确和全面。

座谈会还提出了今后进行进一步讨论的主题,包括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的问题;新民歌的发展和提高问题;诗歌的形式问题,包括民族形式和现代格律诗等问题。“五四”以来新诗运动的估价问题^[73]。

座谈会之后,关于诗歌形式的文章陆续发表,但在观点上并没有太多突破。何其芳回顾和总结了围绕他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论,写成《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一文,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萌芽》、《雨花》、《星星》等刊物也开辟了相关的专栏。

1959年,随着“大跃进”种种弊端日益显露,新民歌存在的各种问题不断暴露出来。毛泽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认识到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创作,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批评《红旗歌谣》等新民歌集“水分太多”。1959年3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取消诗歌卫星。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以及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严重饥荒,不论是群众或文艺界都没有了所谓创作热情。关于诗歌道路的讨论也逐渐平息下去。该年恰逢“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对新诗的评价有所提高。更多讨论如何发展新民歌,包括吸收新诗、外国诗歌的元素“古典、民歌、五四新诗体这三个基础应该结合、统一……在这个统一的一元之下,再来个姹紫嫣红、百花齐放”^[74]。5月20日,经胡乔木倡议,《诗刊》编辑部召开诗歌座谈会。胡乔木的发言,历数从古至今诗歌格律的发展演变过程,提出“新诗是中国诗的历史的合理的发展,而不是外来形式的影响的结果,尽管外来影响起了很大作用……不同的体裁都有发展的前途,都可以提倡,都不要排斥”^[75]。从此,失去了毛泽东支持的新民歌运动逐渐偃旗息鼓。

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在文艺领域的体现。文艺界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不甚光彩的角色,使文艺的发展偏离了健康的道路。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注释:

[1][2]萧三《最好的诗》,《人民日报》,1958年2月11日。

[3]《入社第四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农村大跃进歌谣

- 选》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5页。
- [4]徐迟《人民的歌声多嘹亮》,《文艺报》,1958年第4期。
- [5]臧克家《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一读了“人民日报”上所发表的“最好的诗”以后》,《春风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 [6]《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3月22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799页。
- [7]郭沫若《关于大规模收集民歌问题一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8-16页。
- [8]郭沫若《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中国青年报》,1958年4月16日。
- [9]郭沫若《向地球开战》,《人民日报》,1958年4月8日。
- [10]郭沫若《声声快》,人民日报,1958年8月23日。
- [11][12]郭沫若《百花齐放》,《人民日报》,1958年6月27日。
- [13]郭沫若《百花齐放》,《人民日报》,1958年4月3日。
- [14]郭沫若《百花齐放》,《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
- [15]郭沫若《百花齐放》,《人民日报》,1958年6月5日。
- [16]《采风大军总动员一首都文艺界民歌座谈会纪要》,《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32-33页。
- [17]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杂志,1958年第1期,第33-39页。
- [18]周扬、郭沫若《编者的话》,《红旗歌谣》红旗杂志出版社1959年版。
- [19]袁水柏《成长发展中的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诗歌》,文艺报编辑部编《文学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第136页。
- [20]《歌唱大跃进》,《人民日报》,1958年4月13日。
- [21]林陵《诗歌的道路》,《人民日报》,1958年5月16日。
- [22]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文艺报》,1958年第16期,第13页。
- [23]毕格飞《破除迷信,坚决学习民歌》,《文艺报》1958年1958年第16期,第19页。
- [24]《大家动手,及时捕风》,《民间文学》,1958年3月号,转引自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 [25]《云南少数民族文坛百花争妍》,《人民日报》,1959年6月11日。
- [26]《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文艺报》,1960年第15-16期,第15页。
- [27]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文艺报》,1958年第16期,第13-18页。
- [28][29]沐阳《进一步贯彻作家与劳动群众结合的方针,充分反映大跃进中的人民英雄主义—作家深入生活座谈会报道》,《文艺报》,1958年第17期,第13页、第12页。
- [30]臧克家《春风集后记》,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06页。
- [31]徐迟《暖泉乡》(街头诗三首),《人民日报》,1958年5月6日。
- [32]田间《引水令》,《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
- [33]臧克家《庆丰收》,《春风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0-32页。
- [34]沙鸥《龙王偷看拦河坝》,《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 [35]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7页。
- [36]邵荃麟《民歌·浪漫主义·共产主义风格》,《文艺报》,1958年第18期,第12页。
- [37]贺敬之《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3页。
- [38]李人威《谈谈浪漫主义》,《热风》,1958年9月号,转引自《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1期,第25页。
- [39]臧克家《理想 热情 诗意》,《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5页。
- [40][45]郭小川《我们需要最强音》,《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9页、第8页。
- [41]姚文元《伟大的诗—论新民歌》,《跃进文学研究丛刊》,1958年第2期,转引自《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1期,第27页。
- [42]臧克家《新的形势,新的口号》,《文艺报》,1958年第22期,第16页。
- [43]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文艺报编辑部编《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家出版社,1958年10月版,第33页。
- [44]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文艺报编辑部编《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5页。
- [46]贺敬之《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文艺报》,1958年第9期,第4页。
- [47][48][49]《本刊举行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座谈会讨论要点的报道》,《文艺报》,1959年第1期,第39页。

- [50]《座谈会记录》,《处女地》,1958年8月号,转引自《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1期,第30页。
- [51]刘芝明《在全国艺术科学研究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戏剧论丛》,1958年第2辑,转引自《报刊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1期,第29页。
- [52]邵荃麟《门外谈诗》,河北人民出版社编《开一代诗风:论诗歌创作的新路》,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 [53]宋垒《第三种“化”》,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5页。
- [54][55]闻山《漫谈诗风》,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31页。
- [56]郭小川《诗歌向何处去》,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 [57][59]韩郁《诗歌下放真正的涵义》,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27页、第129页。
- [58]雁翼《对诗歌下放的一点看法》,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16-117页。
- [60]悟迟《诗歌不是诗人的专利》,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20页。
- [61]沙里金《我不同意雁翼同志的看法》,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19页。
- [62]曾子西《为诗歌的发展开拓道路—介绍诗歌问题的讨论》,《文艺报》,1958年第20期,第25页。
- [63]红百灵《让多种风格的诗去受检验》,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26-127页。
- [64]红百灵《我对诗歌下放的补充意见》,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48页。
- [65]李亚群《我对诗歌道路问题的意见》,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77-189页。
- [66]何其芳《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191-192页。
- [67]卞之琳《对于新诗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01页。
- [68]宋垒《与何其芳卞之琳同志商榷》,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07-208页。
- [69]卞之琳《分歧在哪里》,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15-219页。
- [70]宋垒《分歧在这里》,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一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221页。
- [71]沙鸥《新诗的道路问题》,《人民日报》,1958年12月31日。
- [72]卞之琳《关于诗歌的发展问题》,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二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45-56页。
- [73]《诗歌问题座谈会继续举行》,《人民日报》,1959年1月21日。
- [74]郝御风《略谈“新诗体”与“民歌体”统一结合的问题—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诗刊编辑部编《新诗歌的发展问题》(第三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第76页。
- [75]胡乔木《诗歌的形式问题》,《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8页。

(责任编辑:胡晓明)

Key words: development of post-secondary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competence promotion

Modern Design Ethics and Quality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of Design Majors

WANG Zhi-qiang

(Nanjing Xiaozhua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1171 , China)

Abstract: Nowadays , society has evolved into a highly material civilized age , and people have been unprecedentedly dependent on material world created by themselves , so that they step forward into self-materialization unconsciously. It is urgent to reflect the ethics in the name of future , transcend the ‘no hurt’ baseline of design , and highlight th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in design. Taking all these measures to adapt people’s unhealthy lifestyle , rebuilt social value system and re-examine perfect design in view of ideal goal for design ethic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anwhile , it is the quality education for students to be adult. The education idea of “perfect design” must not neglect positive and noble outlook on life , as well as ethics.

Key words: design ethics; perfect design; lifestyle; social morality

Some Issues on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I Liang-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Abstract “The suppression of counter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s a massive political cleaning movement in the early 1950’s. Based on a large amount of historical data , especially the original file , the paper explores the four issues: the starting and ending time , the motivation of the campaign , the number executed persons and the evaluation of the movement , reviewing the some ideas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study is the latest and most systematical and comprehensive achievements of the topic.

Key words: suppression of counter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uo Ruiqing “Double Ten” directions

New Folk Movement in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SHI Xing-yu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were involved in the new folk movement launched i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period.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were engaged in the entire process , from the collection , collation and publishing of the folk songs , from study and honor the art value of the folk songs , from two great discussions on creating approaches of the folk songs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poetry , from participating in the creation and publishing many new Folk Song works.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layed a less glorious role in “the poetic leap” , deviating from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entire literary. This period of history tells us that only genuine “Hundred Flowers Principle” can achieve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new folk movement; the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